

苏曼殊与 中国文学现代 转型研究

SUMANSHU YU ZHONGGUO WENXUE
XIANDAI ZHUANXING YANJIU

黄轶◎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苏曼殊与 中国文学现代 转型研究



ZHONGGUO WENXUE
XIANDAI ZHUANXING YANJIU

黄轶◎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曼殊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研究/黄轶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6. 7

ISBN 978-7-5473-0976-6

I. ①苏… II. ①黄…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
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0725 号

苏曼殊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研究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毫米 1/16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9.25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976-6

定 价: 5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021)52069798

目 录

绪论 史学剪裁与写作缘起 / 001

第一章 解读之津：文化冲突中的审美人生 / 012

第一节 身份言说：生平交游与文化参与 / 012

第二节 思想再论：启蒙尝试与佛禅肯认间的审美抉择 / 024

第三节 文本重解：抱慰生存悖论中的个体挣扎 / 036

第二章 译界之虹：苏曼殊文学翻译及文学转型意义 / 047

第一节 苏曼殊翻译的三大板块 / 051

第二节 苏曼殊译学思想：对“意译”末流的抵制 / 074

第三节 苏曼殊文学翻译的史学意义 / 082

第三章 浪漫之桥：苏曼殊与五四浪漫抒情派文学 / 104

第一节 自叙性叙事：通向浪漫抒情之桥 / 106

第二节 出入古典与现代审美间的浪漫绝句 / 127

第三节 诗情小说文本与五四浪漫抒情小说的勃兴 / 157

第四章 “鸳蝴”之渡：贯通雅俗之间的苏曼殊小说 / 174

第一节 民初小说雅俗格局中的苏曼殊哀情文本 / 176

第二节 爱情的“发现”与意义重估 / 199

第三节 苏曼殊小说与现代文学悲剧意识的历史生成 / 211

第五章 现代之省：苏曼殊与清末民初研究的文化反思 / 227

第一节 由苏曼殊看 20 世纪初文化生态 / 230

第二节 苏曼殊与清末民初研究热的文化动因辨析 / 240

参考文献 / 250

附录一 苏曼殊研究资料汇编 / 257

附录二 苏曼殊创作年表 / 292

后记 / 302

绪 论

史学剪裁与写作缘起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中国思想文化界急剧变动的态势用“狂飙猛进”来形容可能最为恰切,异邦新知新观的传入与本土传统的交锋,本土传统在自身演进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裂变与重组,使清末民初一代知识分子的宇宙观、社会观、生命观在潮起潮落中跌宕,新的人格理想的建构面临着转型期的各种困惑,新的文人群落和文艺变局也便在矛盾纠葛中酝酿萌生。苏曼殊(1884.9—1918.5)短暂的一生适逢其时。在 20 世纪文学史、佛教史、绘画史上,苏曼殊的名字似乎富有炫惑的魅力——他的“断鸿零雁”的生涯、“披发长歌”的壮怀、“白马投荒”的执着、“以情证道”的虚妄、“沿门拖钵”的苦行、“行云流水”的浪漫、“冥鸿物外”的放达、“此志落拓”的抱憾……对于一拨又一拨文人永远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千千结;他的“言辞孤愤”的杂论、“灵月镜中”的诗格、“哀感顽艳”的说部、“事辞相称”的译作、“自创新宗”的绘事……对于一代又一代学子永远有解读不尽的召唤力。很多学者对这个在文学史上习惯归入近代的文学家做过较深入研究且有著文立说,如早期的章太炎、柳亚子、柳无忌、杨鸿烈、张定璜、周作人、郁达夫、陈独秀、陈子展等;近期的任访秋、裴效维、马以君、李欧梵、陈平原、宋益乔、邵迎武等;在日本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也有不少学者做过或正在做着苏曼殊研究,如增田涉、饭塚

郎、梁锡华、慕容羽军等,这是一支强健的队伍。

苏曼殊驾鹤西去是在五四文学革命方兴未艾的1918年5月,这场文学革命的主将陈独秀与苏曼殊有过很深的交往,1916年苏曼殊的小说《碎簪记》就发表在改组后的《新青年》上,是这本张扬新思想新文学的刊物的第一篇创作小说。鲁迅、周作人等也都曾经与苏曼殊有过或深或浅的文学因缘,刘半农更是把苏曼殊当作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翻译和研究的前辈向其问教。在苏曼殊圆寂之后,刘半农有《悼曼殊》等诗八首、沈尹默有《读子谷遗稿感题》等诗词八首、刘大白有《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访曼殊塔》诗四首,抒哀悼之情,表仰慕之意,尤其赞叹曼殊上人孤洁高标的人格魅力。具有浪漫情怀的新文学作家大都并不是因为信佛才崇仰这位诗僧,他们喜欢浸润在苏曼殊诗文作品中那种凄清艳丽的情绪,喜欢那种“个人性”的歌哭所弥漫的忧伤情调。如当时被鲁迅称作“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①的冯至,他对苏曼殊同情、钦佩、喜爱之至,于苏曼殊示寂五周年纪念之日作《沾泥残絮》,称赞苏曼殊的诗“不即不离,全以真诚的态度,写燕婉的幽怀,不染轻薄的气息,不落香奁的窠臼,最是抒情诗中上乘的作品”,他把苏曼殊遗诗当作自己“最好的朋友”^②。田汉曾把苏曼殊与法国19世纪最伟大的抒情诗人魏尔伦等人相提并论,称许他们同是绝代愁人,“才能同作这样绝代伤心的愁句”^③。

但是,读者、作家欣赏归欣赏,冷静旁观的文学史家对苏曼殊的取舍一直很尴尬。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作了《清代学术概论》;胡适在《申报》五十年纪念增刊上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对于晚清诗人推崇的只有郑珍和金和,后来胡先骕在《评胡适〈五十年来中

①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鲁迅全集》第6卷,第2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冯至:《沾泥残絮》,《苏曼殊全集》(五),上海北新书局1947年版。

③ 田汉:《苏曼殊与可怜的伧离雁》,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上海北新书局1947年版,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本。

国之文学》》中加进了高心夔、江湜等人,而苏曼殊始终没有一个位置。这些史类论著的发表成为一批新文学作家追怀苏曼殊的导火索,在他们看来为半个世纪中国文学立传的文章,不应该没有新文学阵营无论在人格精神上或是在文艺理想上都引为同仁的苏曼殊。那时正当五四的帷幕刚刚降下,具有浪漫气质的新文学作家似乎还没来得及反思这场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可能存在的盲目性因素,面对着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人文精神与强大的封建人文语境之间巨大的落差所造成的阻抑,曾经希望把民族和国家掬在自己肩膀上的激昂澎湃的热血冷却下来,受挫的苍凉感骤然降临,鲁迅所谓“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其中的况味值得揣摩。于是,有人才开始了对“文学”之为“文学”的思考。

实际上在 20 世纪初,当梁启超首倡的新文学功利观把文学的政治历史功能推向极致的同时,非功利的文学观也开始了探寻铸造新的艺术特质和审美品格的步伐。正如后世学者所辨析的:“作为构成新文学历史的重要维度,两方面在对立互补中共同承担并完成着新文学的创造与发展。”^①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以历史价值、工具理性的单向度诉求评价 20 世纪中国文学,把古与今、进步与落后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视为文学研究的基本模式甚至唯一模式,忽略了文化—文学中多重价值范畴和多种文学形态的实际存在,文学研究从结构形态到话语方式笼罩着“整体叙事”的元话语性质,意识形态叙述形成的线型结构造成了诸多“盲点”。

不被看好又常被提起似乎是历来相信“因缘”的苏曼殊一份不尽的人间因缘。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以“革命”为主线或以“政治”为轴心的文学史上,苏曼殊总是一个无法无视的角色;而在肯

① 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编),第 172 ~ 173 页,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7 年版。

定其“爱国”、“革命”、“民族主义”的同时,单单薄薄地挂在那里,还要有一个结结实实的批判尾巴,例如北京大学 1955 年所编的《中国小说史稿》认为,苏曼殊“在小说中竭力追求‘悲惨’,有时故意制造辛酸,欣赏极为颓废伤感的情绪,影响很坏。从艺术上看,苏曼殊的小说结局往往是公式化的,人物大都没有个性。但由于作者很有文学修养,又善于捕捉人物的心理变化,写景状物也细致入微,这就使作品具有很大麻醉性。苏曼殊的作品对‘鸳鸯蝴蝶’派文学有较大影响,作用是反动、消极的”。^①这套文字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不过它从思想意义上全盘否定了苏曼殊的作品,而且“殃及池鱼”地连他好的文学修养,以及在小说叙事现代转型过程中富有创辟性价值的“心理描写”和“写景状物”都成了故意害人的“麻醉剂”,倒也未必公允。

“现代性”作为 20 世纪文化的元话语,操纵了 20 世纪末的文化反思和文化批评。“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之间紧张的历史。现代存在迫使它的文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这种不和谐恰恰正是现代性所需要的和谐”。^②20 世纪的总体框架也就是现代性的无边视域,现代性的多元价值也就决定了现代性认识的多重视角。现代性既有着哈贝马斯所说的“自我确证”的内在要求,也有着通过不断的自我质疑、自我批判以达到自我更生的力量、冲动和可能^③。对“现代性”话语本身的追问和反思日益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主要的主题。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伴随着中国文化界对于现代性反思的逐渐深入,文学批评界对于以往过于激进的文化姿态和意识形态话

① 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五五级《中国小说史稿》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小说史稿》,第 405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版。

② [英]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第 10 页,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年版。

③ [德]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时代意识及其自我确证的要求》,载《学术思想评论》1998 年第 3 期。

语模式开始进行重新思考,文学史研究提出“回到现场、触摸历史”的努力方向,其目的在于发掘那些被我们既往的文学史所忽略或曲解但具有丰富生命力的资源,这些资源是文学历史“实在”存在的因素,是触及历史症结和文学脉络的关节点,但正因其“关节”位置所自然蕴含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分量,它们曾经被疏忽了或者相反——被挥霍了。苏曼殊无疑就是这类资源中的一部分。苏曼殊对于中国文学从古典形态向近现代形态转换的创辟作用也就在此时开始引起一些研究者的重视,如李欧梵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陈平原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都充分肯定了苏曼殊文学作品这一方面的价值。在这些研究的推动下,苏曼殊“新文学先驱者”的定位似乎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他的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之初较为典型和优秀的文本,突出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企望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欲望启蒙,追随革命,以及其间的诸多悖论性苦恼与抉择。苏曼殊曾被称为中国古典文学殿军时代的“末代文人”,那么从中国文化和文学现代转型的研究视野来看,他却是20世纪文学的创辟者之一——从“末代文人”到“创世文人”这个视角的转换呈现给了我们壮丽的景观。

当然,以上只是从比较宽泛的研究而言。其实,新时期以来的每位研究者都试图对苏曼殊这样一位清末民初特立独行的“奇人奇才”的思想、创作和文化交流作出自己的把握和理解,而系统精审地对其文艺成就作出评价、特别是对其在中国文学“现代性”转换中的作用作出细致而恰当定位的著述至今还付之阙如,对苏曼殊文学深层次的个性化、主体性研究还很缺乏。究其原因,即近世“以科学为术,合理为神,功利为鹄”的文学史观和“方法论”做派至今在中国很有市场,细分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意识形态化的批评观以政治审美、道德审美代替艺术审

美。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 20 世纪文学研究界对“革命”一面的强调,导致对苏曼殊所谓的“虚无主义”与“颓废主义”的批判;而以道德主义的批判来代替文学批评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由来已久,“道德救世”的批评模式弥久而常兴。第二,长期以来以“启蒙”和“革命”为鹄的的新文学对通俗文学的拒斥和对其价值的偏狭理解。苏曼殊小说《断鸿零雁记》一直被称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鼻祖,周作人认苏曼殊为鸳鸯蝴蝶派的“大师”^①,这些评价本来不含贬抑。而新文学阵营对鸳鸯蝴蝶派或者说对都市通俗文学的批判自然也把苏曼殊扫进了所谓的“末流”。第三,白话文学的思维模式严重干扰了对苏曼殊文学价值的公允评价。五四新文学以白话文为中国文学唯一正宗的“活文学”,其他文学都是“死文学”,胡适更把白话文学视为千百年来中国文学唯一的目的地,“一千年来,白话的文学,一线相传,始终没有断绝。……近五年的文学革命,……老老实实地宣告古文学是已死的文学,他们老老实实地宣言‘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他们老老实实地主张现在和将来的文学都非白话不可”^②。语言的白话化应该说确实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一件划时代的壮举,一定意义上讲,语言形式的变革是标举五四新文化运动成就的重大例证之一。不关涉文本的精神内涵,只视白话文学为唯一有理由存在的文学,这种武断的思维模式影响了几代学者,苏曼殊的文言创作自然也被打进了“死文学”。所以,苏曼殊至今在文学史上的定位仍然陷于两难境地:文学研究的历史理性、语言理性信仰所造成的对于通俗文学价值内涵的遮蔽,从“政治”小说到“辛亥革命”小说再到“鸳鸯蝴蝶派”小说过渡性现代转型的两个支脉即通俗文学和新文学(包括强调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两种文学方向),两

① 周作人:《答芸深先生》,见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五),第126~129页。

② 胡适:《五十年中国文学的变迁大势》,见胡适、周作人《论中国近世文学》,第5页,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

套评价体系始终没有引起学界的充分理解和足够重视,对通俗文学一概而论的拒斥立场不能廓清文学家苏曼殊到底留给后世的是什么;一元论价值体系所造成的对于新文学发生的传统源流的遮蔽,对苏曼殊古典性或民族性的强调和批判也不能厘清苏曼殊小说的审美价值和对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启作用。以前的文学史强调的是他作为20世纪第一个革命文学社团南社诗人“革命”的一面,批评其小说表现的“消极遁世”和“浪漫风格”,而现在更多的边缘性研究则纠缠于其“宗教情结”、“凡尘留恋”、“身世困惑”、“情感挫折”等。即便是倡导“雅俗”双翼的“俗文学”学派,对苏曼殊也存在有误读。

当前中国文学史观念的整合与转型研究意味着破除长久形成的狭隘、封闭的“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确立文学研究的现代理性精神,从而在新的历史视野中建构现代文学史的新结构、新形态。文化作为一种表意实践,通过符号及其意义的传递构成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表意实践的转换是艺术的功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出现的除了风格和主题外另一个深刻的变化,审美现代性正体现了这种转换。审美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中审美关系的反映、产物,与现代性存在多元一体的关系:审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产儿,即现代性孕生审美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叛逆和批判者;审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重建者和超越者,这一辩证立场使得审美现代性这个命题富于思想的张力和开放的空间。这一审美转换具体体现在审美态度上,审美态度在东西方表现着不同的思路和方法。在西方,注重思考审美理论的纯粹性和形而上学性,在东方常常表现为审美态度和艺术人生的相互转化,强调其形而下的一面。“三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时期的梁启超及五四人的现代性主题往往以日常生活的批判和深层文化启蒙为对象,暴露传统日常生活模式的惯性和日常主题的沉沦性,忧切远远大于审美,治病疗伤

的主题先行从根本上妨碍了文学现代性纯粹的审美进程,而与此同时,王国维和苏曼殊分别在理论上和文学实践上开启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另一条思路。现代知识分子运用西方美学观念与美学思想梳理传统美学和美育教育并付诸创作实践,无疑预示了审美思想转变的到来。正因为现代性的开放性、多元性结构,更因为中国现代性发展的迟滞,我这里所理解的中国文学审美的现代实现与西方审美现代性所强调的“反现代性”美学意识形态既有一致,又有出入。美学的现代化作为文学现代性追求的一元,既有对启蒙现代性的超越,又强调两者的互动互补,或者说中国的审美现代转化跟社会学意义上的关联更少,而是把属于感性美学的艺术立场、对历史功利观念的疏离所形成的个人化的抒情性和写意性,以及文学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个人价值”的实现和自我的道德肯认、对抗平庸世俗和以文化的姿态参与中国现代精神缔造及其对抗中呈现的悲剧精神和美学风范,作为现代文学审美追求的主要内涵。从这一层面来说,在所有的审美形态中,美学的再生形态在中国现代美学中最富有原创性并最具有思想史意义,这一“再生”是进步意义上的。

1904年,王国维在《教育丛书》刊发《〈红楼梦〉评论》一文,正值梁启超诸人倡导小说界革命。王国维从叔本华的“欲望说”和“痛苦说”出发,认为个体人生、群体社会、民族国家,这一切都是“欲生之心”的产物,生活的本质是无时不在的欲望。但因为欲望的本质是无法满足的,人必须超越生活的欲望,在纯粹的审美境界中获得精神的升华和满足,“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①。随后,王国维写了《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从解决欲望出发,提出了“超功利”

① 王国维:《王国维评论》,见《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的“形式之美”。他把美的形式分为两种,第一种形式是客观对象本身所具有的纯粹形式的和谐美,第二种形式即为古雅,是创作过程中的形式化的结果,将主体感悟的第一种形式形式化为客观物态。王国维提出“实践之方面,则以古雅之能力能由修养得之,故可为美育普及之津梁。虽中智以下之人,不能创造优美及宏壮之物者,亦得由修养而有古雅之创造力;……故古雅之价值,自美学上观之,诚不能及优美及宏壮,然自其教育众庶之效言之,则虽谓其范围较大,成效较著可也”。这里,王国维倡导了“审美人生论”。与梁启超以文学作为启蒙工具而达到开启民智不同,王国维的文艺观较多地脱离了政治而偏向审美,他的美学理想描画的理想人格是个体的生命伦理而不是社会的政治伦理。由此我们看到,美学思想的现代性转换以个体性和主体性为内核,它是审美—艺术现代性的总称,它既代表审美体验上的现代性,也代表艺术表现上的现代性。在现代性的诸方面,审美的现代转换是非实用或非功利的,但这种非实用属于“不用之用”,“夫文章者,国民精神之所寄也。精神而盛,文章固即以发皇;精神而衰,文章亦足以补救,故文章虽非实用,而有远功者也”^①。“非实用”恰恰指向了现代性的核心——中国人对民族与自身的感受性体验及其艺术表现。相对于梁启超启蒙现代追求的呐喊,王国维的声音似乎是微弱的,其实他并不是孤军作战,与王国维理论出笼的同时,苏曼殊开始了他在创作实践中现代性意义上文学审美的追求,这正是本书的核心论题。苏曼殊的凸显“提示了重新清理 20 世纪,特别是世纪初文学与思想的必要性”^②。

苏曼殊最初征服读者的当然是他真诚的人品和文品。“真诚”在某点上意味着非常个人化的叙述,因为真诚本身就是“个人”的,所以

① 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载《河南》杂志第4号(1908年5月)、第5号(1908年6月)。

② 程文超:《1903:前夜的涌动》,第147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真诚的叙事有时甚至仅仅就是自己的,但这并不妨碍文学的力量与价值。恰恰相反,真正有力量、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往往就是这种非常个人化的真诚的文字,正如郁达夫在谈到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及其对文学的作用时曾发表过的见解:“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若是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哪里会有?”^①当逐渐走出感性的抚摩,进而通过对苏曼殊作品细致的阅读进入一种理性的把握,笔者分明看到了他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史上作为一个过渡者的意义。风花雪月的苏曼殊不应该是苏曼殊的主体特征,诗僧、情僧、画僧、革命僧的苏曼殊或者是某些论者哗众的喧嚣,或者是特意指认了他的某个侧面,以稍显单薄的艺术的、审美的姿态参与文化历时性建构的文学家苏曼殊才真正代表苏曼殊流传于世的理由,他以他的文字呈现了他对文艺观念和生命个体的审美立场,成为“个人的发现”的新文学的源泉。自此而言,五四浪漫主义思潮中个人主义的泛滥,那过分的病态和虚情的审美趋向,苏曼殊也自然是不能免责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以当今学界公认的20世纪文学整体研究为理论基础之一,试图打通近现代文学研究的条块分割状况,把苏曼殊放在20世纪初社会历史背景、文化思潮、文学观念、哲学流派下进行考察,运用文化背景分析、文本互涉分析、比较分析、风格分析等,并参以适当的考辨,来构筑文化史上堪称“个案”的苏曼殊作为一个自觉的文学家的全貌,尝试对苏曼殊无论艺术上或是精神上的丰富性、多元性作出更为合理的阐释,从宏阔的视角对苏曼殊的创作和翻译进行归纳,尽力还原和探索作为文艺家的苏曼殊在20世纪初中国文学审美形态从古典向现代转型过程

^①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中的文学影响,并对其重要的文学史价值提出理论批评,通过苏曼殊的文学精神——文学作为“情感个人”的言说,呈现那个过渡时代的学问饥荒、信仰危机以及国家伦理与个人伦理之间的张力,从而推演 20 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在从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过渡过程中文化身份的宿命承担。

第一章

解读之津：文化冲突中的审美人生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以来,大陆、台湾以及香港出现了一大批苏曼殊传记或评传类作品,日本和美国也有几个版本,例如李蔚的《苏曼殊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邵盈午的《苏曼殊传》(团结出版社 1998 年版)、王长元的《沉沦的菩提——苏曼殊传》(长春出版社 1995 年版)、香港朱少璋的《燕子山僧传》(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97 年版)、[美]柳无忌的《苏曼殊传》(1972 年英文版,北京三联书店 1992 年版中译本),等等。这些著作各从不同的侧面对苏曼殊短暂而复杂的一生进行了有益的梳理,无疑为后来者的苏曼殊学术研究在资料准备以及认知角度上提供了参照。通过对苏曼殊文学文本以及书信的详细解读,我认识到要真正厘清苏曼殊在各种矛盾纠葛中的身份与思想本相,这里需要对其生涯作重新清理。

第一节 身份言说：生平 交游与文化参与

一、童年岁月(1884.9—1896.3)

苏曼殊出生于日本繁华富庶的商埠横滨,名戡,号子谷,小名三